

中国法院令投资者不寒而栗
华尔街时报文章 (2002 年 4 月 9 日)

(上海。记者 Karby Leggett) 十年前，邵裘德带着成功和财富的梦想回到中国，今天，这位美国商务人员却在上海郊区的一所监狱中忍受煎熬，这种令人惊愕的反差展示了在中国经商而时常会面临的危险处境。

二年前，邵先生，一位美国籍移民，被上海的法院认定 骗逃了国家约\$393,000 的税收而判处 16 年有期徒刑。邵先生坚持说他是无辜的。他和他的家属说，法院和公安机关以前不给他机会来搜集可以证明他无罪的证据。而法院的文件显示，判他有罪依靠的是如下二项证据：一个被 证明有大量骗税行为的中国籍个人的供述和公诉方说邵先生在被单独关押期间曾作过但邵先生本人却否认作过的所谓有罪坦白。

经过一年多的核查法院、银行、财务会计等有关材料，邵先生说他现在可以证明他的清白无辜了。但是现在他却遇到另一个障碍：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显得很不愿意裁定重审此案，他和他的家人说，因为重审就可能把上海法院所犯的令人难堪尴尬的错误暴露出来了。

“庭审时，我根本无法为公司和自己进行辩护，因为我一直与世隔绝地被关押着”，邵先生在最近请美国驻沪领馆转交给布什总统的信中说，“根本没有实事求是，公平公正而言。”

市税务和公安的官员都拒绝对此案作评论，曾经驳回上诉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戴友文法官也拒绝对此案的一些问题作答。

随着中国对外国投资越来越有吸引力，邵先生的处境却及时地提醒人们注意到一个司法独立难以保证和税务法规模糊多变的国家中经营的危险性。现有 39 位美国籍人士，大多数都是像邵先生那样的华裔人士，因被判犯获取国家机密、行贿和偷税等罪名而被关押在中国。

但是几乎任何一个在中国被逮捕的人士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获得律师的帮助，尽管中国的法律对此有保证，在实践中却常常受到限制甚至被拒绝，中国和西方的律师都这么说。中国的警察也经常用一些西方国家不允许的方式手段来获取证据，并且由于许多涉嫌的犯罪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与中国政府有关，强有力的政治暗潮常常左右着法院的审理、歪曲有关的证据和影响法官，中国出庭律师们这么说。

尽管关押所有在上海的外籍人士的上海青浦监狱拒绝了对邵先生面对面采访的要求，但他的遭遇却可以通过他在狱中写的笔记、采访他在上海的家属以及阅读法院文件来整合出来（自从被送到青浦监狱后，他被允许与外界通信，他常常请美国驻沪领馆递送文件）。

邵先生在上海出生并长大，大学毕业后于 1986 年离开上海去美国。后来他到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学习，1993 年毕业后他和一些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们设立了一个贸易公司，叫做希比威贸易公司，邵先生具体负责上海子公司的经营进口医疗设备的业务。

麻烦的初兆于 1997 年发生；税务稽查人员来到邵先生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地点进行“特别稽查”并且拿走了他们的财务帐册，当邵先生到税务机关去申诉是，却被告知说除非他付约 6 万美元的“税务保证金”，否则“特别稽查”将一直进行下去。邵先生说当时他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这里已经有错。

邵先生继续在中美之间奔波，但 1998 年 4 月的一天他又回到中国刚到上海机场后不久就被公安人员带走了。据邵先生本人、他的家属以及他后来聘请的律师说，他被单独关押在一家地方旅馆有一个多月，没有被允许与家人或律师打电话。中国的官方在带走邵先生后确实通知了美国领事馆。被单独关押一个多月后，邵先生以涉嫌偷税而被正式逮捕，送到了上海市看守所，然后公安机关继续对案件进行了近一年的侦察。在这期间，据邵先生的姐姐和家属说，邵先生只能定期在一张纸片上写一句话给家属，他说他无法见律师。

1999年6月，上海的一个法院决定了邵先生的命运：审判长周芝国法官认定他少交了约253,000美元的销项税给当地政府并且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了约14,000美圆的进项税。9个月后，判决书下来了：邵先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是所有在中国被判刑的美国公民中最长的。

中国法律专家说上海的公安机关和法院在邵先生的案件上至少已经违反了他们自己的一项规定，邵先生直到开庭前一周才见到他的辩护律师，而中国的法律规定他可在几个月前就获得律师的帮助。并且，他的律师和家属对法院判决的依据始终有疑问。第一，公诉方说邵先生在被单独拘禁期间曾作过有罪坦白，而邵先生一直否认作过有罪坦白；第二，陈思诺，一位因把虚开的增值税发票给邵先生而一同受审的本地商人，在庭审时说是美国商人指使他提供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但邵先生否认这个指控。陈先生被认定犯有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而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令人不安的还有，据邵先生的姐姐和母亲说，公安和政府官员在二个不同的场合曾提出要求他们付约300,000美圆的现金，称“这样可以使案子容易处理。”

自从一年多前被送到青浦监狱后，他的家属帮他找到了他以前的手提电脑和一些重要的证据，其中有曾被法院认定他少缴的税项的付款记录。这些付款记录，据他说，正好等于法院曾经认定他少缴的税的数额。

“法院，”邵先生最近从监狱写出的信中说，“犯了很简单的会计错误。”